

中导危机下的国际安全走向与 中国应对*

许海云 白云天

【内容摘要】 中导危机表明冷战后国际核力量结构、规则以及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其原因包括：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国际核军控体系亦发生重大变化；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国际核安全理念造成冲击，使欧美等国在核问题上的态度日趋保守；由于俄罗斯国力衰退，欧洲战略平衡被打破，美俄长期达成的战略默契不复存在；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新的战略理论、机制以及手段，难以有效应对新型战略危险。中导危机给国际核军控体系带来不确定性，迫使其改革。危机同时也带给美国更多的战略选择、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加剧了欧美双方针对欧洲核安全态势与国际核力量结构的认识分歧；迫使俄罗斯重启竞争战略，美俄双方势必重启军备竞赛。中国应该按照维护国际和平的现实需要，以灵活有效的方法应对中导危机，积极主动参与中导危机处置，防止危机的消极影响无限蔓延。同时，中国还应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核安全观，弥补国际社会针对冷战后核力量发展的理论欠缺。

【关键词】 《中导条约》 国际核军控体系 中导危机 美俄关系

【作者简介】 许海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2）；白云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872）

【中图分类号】 D8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2-0058-20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200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多元化模式研究”（17BGJ049）的研究成果。

《中导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是欧洲重要的冷战遗产,是美苏两国1987年就拆除欧洲中程导弹、控制中导技术扩散、维持欧洲战略平衡而达成的重要成果,它和其他相关条约、协议等共同构成冷战时期的国际核军控体系,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这些条约不仅针对特殊领域的利益需求确立了某些规则与规范,而且还确立了一种包括基本制度与结构在内的合法性政治秩序,就像国家宪法一样。”^①然而,美国在2019年2月宣布终止《中导条约》义务,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同年8月2日,美国正式终止《中导条约》。俄罗斯针锋相对,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外长公开声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个极大错误,将会加剧欧洲军事紧张局势。^②2019年3月4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暂停执行《中导条约》。在退出《中导条约》的同时,特朗普还暗示,美国虽不会马上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但条约到期后将不再续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除非美国与俄罗斯都同意将该条约再延长5年。”^③中导危机对国际核军控体系造成沉重打击,给未来国际安全走势蒙上一层阴影。

显而易见,中导危机使国际核军控体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确定性,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紧迫的难题:如何最大限度抵消中导危机引发的消极影响?如何有效控制由于国际核军控危机而引发的军备竞赛?另外,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明确要求中、美、俄三国订立新中导条约,这又给中国提出新问题:如何回应美国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蓄意挑衅?如何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国际核军控体系更趋合理?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导危机的表现、特点以及实质,深入探寻国际社会妥善解决危机的出路,并提出中国的应对方案。

^① Tom Coppen, *The Law of Arms Contr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Nijhoff, 2016, p. 335.

^② Evgeny Buzhinsky and Alexander Khramchikhim, “Russia will not Lose Denunciation of the INF Treaty,” Valdai Club, June 28, 2017,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will-not-lose-from-the-denunciation-of-INF/>.

^③ Mike Eckel, “U.S.: Russia May Be Testing Low-Yield Nukes, In Violation of Treaty,” Radio Free Europe, May 29, 2019, <https://www.rferl.org/a/us-russia-may-be-testing-low-yield-nukes-in-violation-of-treaty/29970491.html>.

一、冷战后的国际核军控斗争与中导危机

如上文所述，中导危机并不只是美俄双方围绕是否废弃《中导条约》的一场竞争与对抗，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各方力量围绕国际核力量结构、规则以及程序等是否需要重构的一场博弈，可谓全面展示了当前国际核军控体系遭遇的困境。因此，要想深入了解中导危机对国际核安全局势所产生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基本走势；其次，需厘清冷战后国际核军控体系遭遇危机的起因；最后，要明晰中导危机的基本表现，以及各大利益关联方的态度与对策。

第一，中导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突变的产物，客观上折射出国际核力量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核力量结构虽然大致保持稳定，但许多规则、程序、路径以及方法正在悄然发生转变，虽然美、俄两国一直是国际核力量结构的主导者，但是核安全行为体的数量不断增多。虽然全球核竞赛不复存在，但围绕战略力量的各种区域级对抗与碰撞开始不断增多。一方面，美、俄两国对当前国际核力量建构的理解出现偏差，双方均认定现有体系无法满足自身需要，国际核军控体系亟待调整和改革。但另一方面，国际核力量结构确实出现分散化、多点分布、复杂化等新趋势，许多国家或区域组织正竭力掌握核武器及其运载技术。

虽然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总体而言，尚未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国家，或者接受可信赖的盟国保护的国家，并没有意愿推行核扩散。”^① 但当前国际核俱乐部确实增加了一些新成员，还有少数国家正在走上拥核的道路，例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伊朗等。这些国家大多游离于国际核力量结构之外，它们所设置的核门槛比较低，其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缺乏有效管控与监督，客观上已经对国际核军控体系构成威胁。“就大国之间现存的核限制而言，伊朗和朝鲜核资产所产生影响，有赖于这两个国家是否继续被视为非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是否像印度一样

^① 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 Monteibo, *Nuclear Politics, 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7.

找到生存之道，能使其作为新的核国家被（国际社会）勉强接受。”^① 从 2006 年至今，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连续进行核试验与弹道导弹技术试验，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与六方会谈机制关于半岛无核化的相关决议，不利于半岛和平与稳定。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评估报告分析，“当前，我们估计朝鲜每年生产 3—5 枚核武器……到 2020 年，朝鲜估计拥有生产 24—48 枚核武器的钚和武器级铀，四舍五入为 25—50 枚。”^② 虽然朝鲜核力量有限，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核军控体系，但会削弱相关的国际规则、程序以及机制，加速国际核力量结构发生变化。

第二，冷战结束后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甚嚣尘上，广为传播，对国际核安全理念形成冲击，使欧美等国对待核武器的立场与态度日趋保守。最明显的代表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国际核安全规则“美国化”，大肆鼓吹美国利益优先，为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而罔顾国际规则、公共道德以及他国利益。进入 21 世纪以来，围绕后冷战时期国际核力量结构，美国就一直坚持霸权主义，谋求绝对的核话语权与控制权。“事实上，2006 年‘四年防务审核’是美国新战略焦点的一个缩影，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法支配区域安全或者全球安全条款。美国试图劝阻任何军事竞争者发展破坏性能力以及其他能力，防止其就此获得区域霸权，或者针对美国及其他友好国家采取敌对行动。”^③ 进而言之，冷战后美国核战略的方向与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必须使威慑力量现代化，以保持其可信度。《2018 年核态势评论》呼吁实现核三位一体指挥与控制系统现代化……核三位一体护佑了 70 多年和平，我们不能让其过时。”^④ 毋庸置疑，特朗普政府将这一目标简单化与绝对化，试图以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推进这

① Malcolm Chalmers, *Less is Better, Nuclear Restraint at low Numb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

② David Albright, “Understand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 Capabilities,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y 9, 2018, https://isis-online.org/uploads/isis-reports/documents/Albright_North_Korea_slides_for_CTR_talk_may_9%2C_2018_final_pdf.pdf.

③ Il Hyun Cho, *Global Rogues and Regional Order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 of North Korea and Ir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3.

④ “New Briefing on the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431945/news-briefing-on-the-2018-nuclear-posture-review/>.

一目标，这就不可避免会对现有的国际核安全秩序与规则造成伤害。

事实上，冷战后国际核安全的复杂程度已远超当前美国所能把控的程度，美国虽拥有强大的战略力量，但却很难有效应对来自多个方向对国际核规则与体系的挑战。“1993 年，美国政策所确立的西方主要目标从不扩散转向反扩散，该变化实际上认可了核扩散无法避免的事实。在适当时候，美国政策将从反扩散转向助力扩散，假如美国政府摆脱冷战既定思维，使扩散更能服务于美国与西方的利益。截至 1995 年，美国和西方继续坚持压制政策，该政策最终注定会失败。在多元文明世界中缓慢但却不可避免的权力扩散中，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一个中心事件。”^①

第三，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国力衰落，欧洲战略平衡被打破，美、苏两国围绕核力量而长期形成的政治默契不复存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科技以及经济实力冠绝全球，“虽然冷战后美国战略力量在数量上缩减，但却变得更加致命。”^② 因此，美国不愿与俄罗斯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平分秋色，而是设想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掌控更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进而言之，美国对国际核军控体系以及其中《中导条约》产生偏见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战略优势与特殊利益诉求并未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导条约》未能有效抑制俄罗斯发展各种新型弹道导弹，亦未能有效压制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发展弹道导弹。“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看法，在最近 20 年，美国与俄罗斯的核目标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是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俄罗斯的安全战略则是追求旨在扩大核武器作用的新理念与新能力。”^③

从小布什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一直指责俄罗斯违约发展各种新式中程弹道导弹。美国认定俄罗斯研发的某型陆基巡航导弹射程在 500—5 500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thin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p. 231-232.

② Karl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 13.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 C.: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ecember 2012 p. 69,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公里之间，违反了《中导条约》。^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为此特别强调，“这一重要条约当前正面临危险，俄罗斯已经采取措施，开发、试验和部署陆基巡航导弹系统，该导弹射程超过《中导条约》所限。美国在 2014 年就宣布俄罗斯违反条约义务，尽管美国就该问题与俄罗斯展开积极接触，但迄今为止，俄罗斯官员一直拒绝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讨论这种违约行为，也拒绝美国所提供的信息。”^②

事实上，美国不仅是国际核军控体系的创立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就《中导条约》而言，该条约虽禁止在欧洲部署陆基巡航导弹，但并未禁止在欧洲以外发展海基与空基巡航导弹，这对于重点发展陆基巡航导弹的俄罗斯明显不利，对于拥有先进导弹技术且雄厚财力的美国非常有利。“例如，条约所禁止的中程导弹只是美国和苏联核武库中的一小部分，尽管《中导条约》禁止陆基导弹，但并未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大规模发展海基和空基导弹。”^③ 为此，俄罗斯政府很早就曾指出《中导条约》这一弊端，甚至在 2007 年提出退约要求。俄罗斯认为，“该条约严重偏向于美国与北约，因为海基、空基巡航导弹使它们无限受益，却使俄罗斯陆基巡航导弹受到限制。俄罗斯发现其安全环境不利，有很多邻国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与陆基巡航导弹，使俄罗斯的关键目标受到威胁。”^④ 但是，特朗普政府却固执地认为，《中导条约》并未有效限制俄罗斯发展新型导弹，亦未能限制可能危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发展核武器以及相关技术。这种偏见使美国视《中导条约》和国际核军控体系为仇讎，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极端与偏执手段，美国选择退出《中导条约》正是这种偏见与固执的集中表现。

第四，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管控战略武器及其相关技术的新理论与新机

① “Russia’s Violation of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russias-violation-of-the-intermediate-range-nuclear-forces-inf-treaty/>.

② “Trump Administration INF Treaty Integrated Strategy,” December 8, 2017, <https://www.state.gov/trump-administration-inf-treaty-integrated-strategy/>.

③ Shen Dingli, “What the Post-INF Treaty World Will Be Like,” China daily, February 21, 2019, <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1902/21/WS5c6dea76a3106c65c34ea76e.html>.

④ Vladimir Frolov, “Russia’s Superpower Status Teeters with INF Treaty,” *Moscow Times*, October 24, 2018,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8/10/24/russias-superpower-status-teeters-with-inf-treaty-op-ed-a63293>.

制，无法有效应对各种新型核危险，必然导致极具反智倾向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后者则直接引爆了中导危机。特朗普主义强调美国优先，强调单边主义、利己主义以及霸权主义外交，强调以极限施压方式解决分歧与矛盾。

“特朗普政府周五宣布，将继承奥巴马政府大部分核武器政策，但对俄罗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必须说服俄罗斯，如果它在欧洲发动即使有限的核攻击，都将付出‘无法接受的可怕代价’。”^① 特朗普的战略理念和手段追求极限目标，与美国战略传统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与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需要与安全理念相距甚远。美国以持续升压方式压迫朝鲜和伊朗等在拥核问题上让步，既反映了国际社会缺乏关于削减战略武器、降低国际军备水准的新理论与路径，亦反映了美国缺乏有效的核危机处置理论与手段。

虽然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了两次“特金会”，但始终未能解决朝鲜拥核问题，美朝关系反而持续恶化。美国在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简称《伊核协议》）的同时，亦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对其持续施压。但是，特朗普对伊朗施压的直接结果是伊朗宣布只能部分履行协议。针对美国大规模陈兵波斯湾之举，伊朗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同时要求美国赔偿蓄意在伊朗制造社会动乱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在美国动用无人机击杀伊朗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之后，伊朗政府公开宣布不再遵守《伊核协议》的任何限制，英、法、德三国为此宣布启动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试图和美国联手，共同阻止伊朗最终获得核武器。

更特殊的是，为了摆脱“通俄门”压力，并满足美国军方与建制派的要求，亦为了满足自身成就政治与外交功业的目标，特朗普大肆鼓吹俄罗斯战略力量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且还有向全世界扩散的危险。“核威胁在本质上从相互销毁，转为如果核武器丢失、被盗或者以某种方式脱离俄罗斯政府的控制，究竟该怎么办？”^② 特朗普此举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为

① “Trump Nuclear Policy will Adopt More Aggressive Stance Toward Russia,” CBS,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nuclear-policy-will-adopt-more-aggressive-stance-toward-russia/>.

② James Conca, “Doomed to Cooperate—Russia, The U. S. and Nuclear Weapon After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Forbes, July 12, 2016.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conca>

自己修正国际核军控体系寻找借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采取对俄罗斯软硬结合的灵活战略，虽持续施压，但从未停止对话，按照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莉森（Graham T. Allison）的说法，“没人能忽视俄罗斯政府发动的攻势，包括发出核战争叫嚣、干涉乌克兰、在叙利亚随意实施轰炸、国内侵犯人权事件频发。但是，由于俄罗斯过于强大，无法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挑战就是如何在与俄罗斯有交涉的领域推进美国利益、在出现分歧的领域实现管控。”^①显然，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投机心态以及实用主义政策，虽然可能在政治上给政客们加分，但却无助于彻底解决美俄关系中的政治矛盾与利益纠葛，只能听任美俄竞争与对抗持续升级。

二、中导危机对美、俄以及国际安全结构的影响

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核事务中的重大事件，中导危机必然会影响美俄关系、国际核安全结构、欧洲乃至国际安全秩序。“美、俄退出《中导条约》，表明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战术核武库的发展导致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更大程度不稳定，特朗普和普京一直拒绝国际规则。”^②中导危机的影响已经超出核安全领域，深入与国际安全相关联的其他各个领域，而且所涉及的对象亦不限于美、俄两国，还包括其他许多国家、组织以及区域。

（一）中导危机对国际核军控体系的影响

毋庸置疑，当前国际核军控体系确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例如未能全面反映国际核安全力量的最新变化，未能将朝鲜等国核力量完全纳入国际社会有效控制范围。同时，针对违反《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和其他相关规则的国家，不仅对违约行为缺乏系统检查与核实，而且对涉事国家或组织缺乏有效制裁。尤其在重大国际安全

/2016/07/12/doomed-to-cooperate-russia-the-u-s-and-nuclear-weapons-after-the-end-of-the-soviet-union//.

^① Graham T. Allison and Dimitri K. Simes, “Trump and Russia,” *National Interest*, No. 147, January/February 2017, p. 30.

^② Trey Speegle, “Trump Withdraws From INF Treaty with Russia,” *World of Wonder*, February 3, 2019, <https://worldofwonder.net/trump-withdraws-from-inf-treaty-with-russia-but-dont-worry-its-just-nuclear-bombs/>.

危机与挑战面前，国际核军控体系相当脆弱，不仅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与处置，而且缺乏足够的国际联动，但这些均不足以构成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理由。因为只要战略武器有市场，国际核军控体系就不会过时，就会继续在国际安全秩序建构中发挥作用。“为实现核限制与战略审慎而采取措施，并不构成反核革命，核限制与核废止并不是一回事，甚至与核边缘化也不是一回事。由于核武器尚未被边缘化，对于21世纪想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来说，核武器仍非常重要。”^①中导危机实际上给国际核军控体系带来挑战，将其置于不改革就消亡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核军控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绝不应完全根据美、俄两国的意志推进，而应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安全需要，唯有如此，国际核军控体系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二）中导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军事干预、发动反恐战争、煽动颜色革命，虽借此扩大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但亦深陷一系列冲突与战争中难以自拔。

第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与其他废约、退群之举并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实施战略收缩，以便能够集中力量，实现核心利益最大化。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位高官曾向记者提及，“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在面对潜在对手俄罗斯时，确保我们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确保我们能够长期保持参与竞争的能力。”^②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重点发展美国的核能力与战略影响力。“特朗普特别强调，对美国核武库实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了一项总额1.2万亿美元的计划。特朗普致力于兑现诺言，‘强化’和‘扩展’美国核力量，实现其‘现代化’和‘重建’的目标。”^③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执意退出《中导条约》，并不是想任由国际核力量随意发展，而是意在建立一个完全

^① Stephen J. Cimbala, *Nuclear Deterr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U. S., Russia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New York: Ashgate, 2016, p. 152.

^② “US Defense Bill Authorizes Development of ‘INF Treaty-Compliant’ Mid-Range missile,” *Russia Today*, November 9, 2019, <https://www.rt.com/news/412525-us-russia-inf-treaty/>.

^③ Gunther Hauser, “No Chance to Re-Negotiate INF and JCPOA before 2021,” *Valdai Club*, May 21, 2019,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chance-to-re-negotiate-inf-and-jcpoa/>.

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核军控新体系，美国不仅要在其中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优势，而且还要享有一切选择、决策以及活动的自由，该体系最终还能确保美国战略利益最大化。

第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看似可使美国不再受国际核军控体系的约束，就此可以随心所欲研发各类导弹，但废约行为实质上属于自我否定或自乱阵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曾公开表示，退约行为是给普京奉上礼物，只能导致俄罗斯更大规模发展战略力量。以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赛德斯（Bob Menendez）、杰克·里德（Jack Reed）、马克·沃纳（Mark Warner）为首的多名议员也公开声称，退约会使美国与欧洲盟国利益受损，会淡化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关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使北约当前无法真正检测俄罗斯的导弹部署，俄罗斯有可能会增加导弹生产与部署。”^①事实上，美国无法通过拒绝所有盟国、合作国甚至竞争国而实现其优先政策，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尤其如此。美国的退约行为等于自动放弃其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包括对国际核事务的领导权、对国际战略力量发展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交往中的道德标准与意识形态等，虽然这并非美国的初衷，但肯定会降低美国对未来国际安全事务的控制能力。

（三）加剧欧美双方在欧洲核安全乃至国际核力量结构上的认识分歧

第一，特朗普执政后采取了许多“离经叛道”的决策与举措，深为欧洲盟国嫌弃，其中，废除《伊核协议》，退出《中导条约》，不再延续《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些做法已经使美欧关系深受影响，使欧洲各国开始有意识地远离美国，双方间隙越来越大。对此，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菲利普·布罗德罗夫（Philip M. Breedlove）就公开对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各盟国政府缺乏沟通与协商表示不满。“我们不能让此举被视为美国的单边主义，这将非常糟糕。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美国需要与我们的盟国保持一致，我们必须拥抱欧洲，与欧洲共同前行。”^②毋庸讳言，中导危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欧洲盟国的影响与掌控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美国在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

^① Trey Speegles, “Trump Withdraws From INF Treaty with Russia.”

^② Daniel Cebul, “Did the US Botch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INF Treaty,” *Defense News*, October 22,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smr/nuclear-arsenal/2018/10/22/did-the-us-botch-its-withdraw-from-the-inf-treaty/>.

构中的盟友、追随者以及支持者无疑会越来越少。美国在中导危机中自行其是、唯我独尊，客观上增加了欧洲盟国在军控问题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同时也增加了改革国际核军控体系的难度。

第二，中导危机使欧洲承受巨大压力，欧洲必然将成为美、俄两国新一轮导弹竞赛的受害者。“就欧洲而言，美国出现战略紧缩的可能，以及东欧与中东地区不稳定局面持续，给欧洲进退两难的处境增添新内容。”^①在美国宣布废止《伊核协议》后，法、德等国针锋相对地表示，欧洲将继续遵守该协议。在伊朗宣布不再接受《伊核协议》的最后限制后，英、法、德三国则直接甩开美国，启动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如此，法、德等国旋即宣布将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用来保护欧洲免受外来威胁。“事实上，法、德双方已在2017年9月关于《危机应对行动中心》的报告中，提出建立1个师或者3个旅，作为迈向欧盟主要目标的第一步，该目标旨在建立1个军团司令部、3个师和9—12个旅。”^②同时，法、德两国还宣布要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专门协调欧洲各国防务与安全政策。可以预见，伴随着中导危机后续影响进一步发酵，欧洲盟国在安全政策上将会更加独立自主，不排除它们会与俄罗斯单独展开对话与谈判，双方会就欧洲某些重大安全问题达成默契，或者欧洲国家会直接推动美、俄两国签订新的限制弹道导弹条约。

（四）中导危机将使美俄双方重启军备竞赛

第一，如前所述，美国虽以俄罗斯违约为由退出《中导条约》，但真正目的是认定该条约已无法满足其安全需要，欲以新协议取而代之。对特朗普来说，俄罗斯是否违约实际上并不重要，国际条约与规则是否有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可以完全摆脱相关国际条约与规则的束缚，代之以能够充分体现美国利益的新条约与新机制。新的条约不仅会让美国比对手拥有数量更多、实力更强、技术更先进的战略力量，而且还能够完全占据文化、心理以及舆论优势。鉴于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以及先进的

^① Luis Simón, “Neorealism,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Europe’s Relative Gains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2, 2017, p. 212.

^② Sven Biscop, “Putting the core at the Centre, The Crisis Response Operation Centre(CROC) and the future of PESCO,”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3, 2019,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content/uploads/2019/11/SPB119.pdf?type=pdf>.

弹道导弹技术，这令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忌惮。更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俄罗斯经常在国际与区域危机中展示其战略力量，尤其在欧洲安全纷争中更是如此，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持续实施战略威慑。”^① 例如，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就一直以在前沿地区部署战略武器、试射新型导弹等方式，对北约及其成员国实施有效的战略压制。由于拥有强大的战略力量，而且不为美欧等国的各项政策与战略所左右，俄罗斯也一直被欧美各个国家和组织视为重塑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中导危机必然导致美、俄两国重启导弹竞赛。这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经过激烈的竞争与对抗，美、俄两国在短期内达成一项新的弹道导弹协议，使双方矛盾迅速得到缓解；二是美、俄两国围绕各种新型导弹研发的较量长期化，甚至出现某种固化态势，双方的竞争延续下去。中导危机爆发后，美、俄两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相互指责，而是陆续展开弹道导弹试射。2019年8月18日，美国率先试射陆基中程巡航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Evgeniy Peskov）为此发表声明，“关于导弹的技术属性，我不会从技术角度做出任何评论，但我们会不断重申，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准备违反《中导条约》义务。美国的举动有力地证明，协议是在美国的倡议下被毁掉的，我们对此深表遗憾。”^② 很明显，在战略武器建设上一贯保持强势的俄罗斯不会坐以待毙。在《2018—2025年国家武器装备计划》中，俄罗斯明确提出在2020—2022年装备空基超高音速导弹，在2025年装备海基高超音速导弹，以此弥补空基和海基导弹研发短板。目前，俄罗斯已完成“匕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在不同区域的测试，部分军队还装备“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西部军区试射和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配有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综合系统也已准备就绪。可见，未来美、俄两国围绕战略武器的竞争和对抗几乎成为定局，而且极有可能长期化。

① Oren Dorell, “U.S. Allies Worry: Russia’s Missile Exercise May Be Top of Nuclear Iceberg,” *USA Today*, October 21, 2016,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6/10/21/nato-allies-worry-russias-missile-exercise-tip-nuclear-iceberg/92434304/>.

② “US Test of INF-Banned Missile is Proof Washington Has Long Sought to Destroy the Treaty-Kremlin,” *Sputnik News*, December 13, 2019,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912131077561687-washingtons-new-missile-test-proves-country-violated-inf-treaty---russian-lawmaker/>.

（五）中导危机将推动更多国家或组织选择自主的战略武器发展路线

第一，中导危机对国际核军控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给国际核安全结构带来不确定性，而且其影响将是长期和普遍的。除影响美、俄两国的战略方向外，中导危机还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战略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日本、韩国、北约、欧盟、欧安组织、东盟等。以北约为例，在中导危机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就曾公开表明态度，“俄罗斯与美国应该遵守《中导条约》，虽然压力很大，但北约应做好没有《中导条约》的准备。”^①毫无疑问，国际核军控体系日渐松弛，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许多国家的战略武器以及相关技术的控制松动，也意味着会有更多国家跨入谋求战略武器的行列。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发展和部署战略武器的国家大都为欧美所排斥，或者其国内存在比较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这些国家由于缺少保护而缺乏安全感。因为美国只向其盟国提供保护，“《2010 年核态势评论》（20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重申，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可信的，美国承诺将加强双边纽带与区域纽带，同时承诺美国将与盟国、伙伴国站在一起，使它们的关系能够适应 21 世纪的挑战。”^②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一直热衷于以高压手段对付这些国家或组织，动辄以极端方式压制其拥核要求，或者直接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这些做法势必会进一步激发它们获取战略武器的意愿。

第二，中导危机导致国际和区域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使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组织以及区域不得不面对各种安全风险。中导危机激化了过去为国际核军控体系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导致世界多个地区爆发局部纷争与冲突。例如，在美、伊两国围绕《伊核协议》的战略博弈中，伊朗政府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开宣布，其海军将大规模生产自行设计、潜射的“贾斯科”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政府还公布了其他几项军事项目与技术成果。正如伊朗海军少将侯赛因·坎扎迪（Hossein Khanzadi）所说，“这种导弹肯定能

^① Shen Dingli, “What the Post-INF Treaty Would Be Like,” *China Daily*, February 21, 2019,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1902/21/WS5c6dea76a3106c65c34ea76e.html>.

^② Inwook Kim and Soul Park, “Deterrence under Nuclear Asymmetry: THAAD and the Prospects for Missil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0, No. 2, 2009, p. 180.

给敌人带来巨大惊喜”^①。毫无疑问，作为中导危机的衍生物，美、伊两国的战略博弈还涉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必然会使整个中东地区长期深陷危机。同样，由于美国与朝鲜的敌对状态不断升级，朝鲜于2019年12月10日宣布，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重大试验，双方开启新一轮隔空争辩。虽然近期美国政府向朝鲜公开喊话，希望在2020年10月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核谈判，但是这一谈判实际上很难改变双方积存已久的矛盾与分歧，更不可能使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可以预见，中东地区与东北亚地区类似的区域矛盾与冲突将会持续下去。

三、中国应对中导危机的思路与方法

中导危机作为冷战后国际核力量结构演进的一个里程碑，直接关系到国际战略力量的分布与发展，尽管此次危机在表面上看是偶然的，但是实际上其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围绕核问题的战略博弈中，特朗普的表现相当随意，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坚持“美国优先”目标，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毫不顾忌国际条约、义务、道义、规则以及程序，甚至公开置盟友的利益于不顾。这给国际政治与安全的基本走势、安全架构以及程序平添了许多困难与麻烦，但并未带来颠覆性转变，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前国际核军控体系中的诸多内在矛盾与分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曾公开声称，《中导危机》并未将中国的中程导弹力量计算在内，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公平的。“特朗普和博尔顿（John R. Bolton）把2007年普京关于《中导条约》的观点抛在脑后，把中国发展中程导弹当作退约的一个理由。”^②美国试图将退出《中导条约》的责任，推给俄罗斯和中国。不仅如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位西方政要也都公开提出将中国纳入中程导弹控制框架。2019年2月18日，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要求中国加入新中导条约谈判。无独有偶，英国皇家国际

^① “Iran Navy Starts Its Mass Production of ‘Jask’ Cruise Missile, Unveils Other Military Projects,” Press TV, November 30, 2019, <https://www.presstv.com/Detail/2019/11/30/612482/mass-production-of-Jask-cruise-missile>.

^② Vladimir Frolov, “Russia’s Superpower Status Teeters with INF Treaty.”

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也在其研究报告中公开声称，中国 95% 的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都违反了《中导条约》。

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先后就中国未参加《中导条约》发声，以不同方式逼迫中国表态，要求中国参加美、俄两国的新中程导弹谈判。此举固然是中导危机持续发酵的结果，但亦是欧美借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机向中国施压，强迫中国交出自身中程弹道导弹及其技术的发展权与使用权。不论是为了回应这些国家的蓄意挑衅，还是面对中导危机后的国际核军控体系改革，中国客观上都需要明确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应该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在中导危机中应该如何应对欧美各国持续施压？应该如何趋利避害、最大程度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中国希望建立怎样的国际核军控体系？等等。很明显，不论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或者意愿如何，中导危机实际上已将中国推上国际核军控斗争的前台，迫使中国必须回答上述问题。^①

（一）参与国际社会对中导危机的处置，防止其消极影响无限蔓延

毋庸讳言，《中导条约》在历史上对维持欧洲战略平衡、抑制美苏军备竞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条约确实存在时代局限，毕竟冷战时期国际安全态势和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相去甚远，美、苏双方均未预见到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对《中导条约》以及国际核军控体系实施改革确有必要。然而，《中导条约》并未完全丧失存在的基础，尽管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极为复杂，但国际核力量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变化，美、俄两国仍拥有全世界 90% 以上的核武器，^② 它们仍是当前国际核安全结构中的两大支柱。因此，对《中导条约》以及国际核军控体系的改革只能是局部和渐进式的，绝非特朗普式的率性退约或者推倒重来。

对中国而言，否认《中导条约》与国际核军控体系的内在矛盾，或者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都是不明智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身孤立，

^①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 2019 年莫斯科防扩散大会的专题发言中指出，“国际军控防扩散机制正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国际军控防扩散机制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妥善应对上述危险趋势所带来的挑战。”环球网，2019 年 11 月 9 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7Rsj9IyjMek>。

^② Victoria Murphy, “US and Russia Sign Deal to Slash Nuclear Weapons, But They Are Still Allowed 1550 Each,” *Mirror*, April 9, 2010, <https://www.mirror.co.uk/news/uk-news/us-and-russia-sign-deal-to-slash-nuclear-213629>.

或者落入欧美各国媒体预设的舆论陷阱。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国际核俱乐部的成员，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建构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与民族历史、发达的经济，在国际事务中拥有重大影响，但是其核力量要比两个超级核大国小很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更多的拥核国家所环绕。”^① 因此，中国不仅不应缺席对中导危机的处置，还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中导危机，争取更多国家或国际组织参与危机处置，以此揭露美国在中导危机处置中推行双重标准、大搞单边与利己行径的实质。“中方反对美退约行为。我们敦促美俄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尽快恢复履约。美俄两国拥有世界上 90% 以上的核武器，在核裁军方面负有特殊优先责任。两国应在切实维护现有条约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削减核武器，为其他国家参加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②

不仅如此，中国还应旗帜鲜明地提出解决中导危机的主张，向全世界说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中国只会将自身的核武器用于防御，只会保持有限战略力量等安全方针。“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坚持自卫防御原则，目的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确保国家战略安全。”^③ 中国坚决反对特朗普政府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安全准则的恶劣行为，积极支持欧洲国家裁军主张及其实践，“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裁军努力懈怠，如果我们允许自身不重视裁军共识，我们头顶的核阴影就会变长、变深，终有一天它会永久遮蔽光明。”^④ 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裁军实践，无疑有助于推动国际核军控体系的正向改革。中国不会按照美欧等国的

① Hui Zhang, “Chinese Position on Disarmament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NikHynek and Michal Smetana, eds., *Global Nuclear Disarmament, Strategic, Politi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 265.

②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并启动退约程序答记者问》，新华网，2019年2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02/c_1124081193.htm。

③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19年7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24/c_1124792450.htm。

④ Malcolm Chalmers, *Less is Better, Nuclear Restraint at low Numbers*, p. 32.

设计推动国际核军控体系改革，更不会按照欧美各国的要求参与所谓的新中导条约谈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 2019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上明确指出，“中国坚定主张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中导条约》造成严重后果，国际社会广泛关切。中方希望美、俄能够回到《中导条约》。我们反对《中导条约》多边化。”^①很明显，中国与美、俄两国拥有的战略力量相差甚远，要中国与美、俄两国承担同样的责任显然没有考虑中国的切身安全诉求，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公平，显然不利于中导危机得到合理化解。中国将坚持和平崛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参与美国挑起的各种毁约、干涉以及制裁行动，用实际行动淡化中导危机带给国际社会的各种消极影响，推动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危机处置，抵制美国肆意改变国际规则的霸凌行径。

（二）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弥补后冷战时期核安全理论空白

众所周知，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以及随后的危机处置均缺乏国际法理依据。不仅如此，国际社会面对新的核安全危机实际上既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也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而美国在《中导条约》的处置手法上，也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单边、利己以及霸权色彩。这在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中能否行得通，则令人怀疑。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不会走向核孤立主义，其单边化政策旨在谋求更大的控制权，特朗普的言行并无理论新意，不过是以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短期利益，以牺牲全局利益换取局部利益，以牺牲软实力换取硬实力。美国利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尤其是利用国际社会对冷战后国际核力量结构及其走向缺乏理论解读的状况，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新构建单极化国际核安全体系，确立新的国际核安全规则，以便最大限度体现美国的安全利益与战略诉求，这种做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将国际社会置于危险之中。

与美国相反，中国一直顺应国际和平、发展、合作大势，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奉行多边主义，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① 《默克尔吁挽救〈中导条约〉》，中方明确反对条约多边化》，参考消息网，2019 年 2 月 18 日，<https://news.sina.cn/2019-02-18/detail-ihqfskcp6183570.d.html>。

的国际发展理念。中导危机爆发后，中国呼吁美、俄两国大规模减少核武器储备，降低战略武器不断升级趋势，避免大规模军备竞赛，重回《中导条约》谈判及相关军控体系中。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多边主义，中国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即不论大国、小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安全事务中均享有同等权利，所有国家均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有助于推动国际安全体系不断趋于平面化，有利于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建构，使其行稳致远。在实践中，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可以最大限度抵消美国单边主义对国际核军控体系造成的损害，推动国际社会不同性质的核力量进行谈判与对话。在理论上，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针对后冷战时期国际核力量的理论建构，进而推动国际核军控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应以维护国际和平为目标，灵活有效应对中导危机

在国际层面，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旗帜鲜明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与规则，以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以合作主义对抗孤立主义，充分发动国际社会所有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掣肘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以更多的平等协商、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安全行为，最大限度降低特朗普政府废约退群行为的影响，使其无法产生效果。事实上，在利用国际机构与平台推进核领域合作等方面，欧盟已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核领域，欧盟在许多机构中展开合作，例如《核不扩散条约》审核大会（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Review Conferences, NPTRC）、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还有一些处于无核武器地带、可以作为示范的区域组织。”^① 显而易见，中国的多边合作也可以依托上述条约与机制展开，这些机制客观上具有抑制中导危机消极影响扩散的作用，中国应该充分重视发挥这些条约与机制的作用，使之确实能够在国际核安全体系改革中真正发挥作用。

在区域层面，中国要广泛联合各种区域组织或者大国力量，共同抵制中

^① Traja Cronberg, *Nuclear Multilateralism and Iran, Inside EU Negoti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5-6.

导危机的消极影响。鉴于美国是中导危机的始作俑者，俄罗斯虽然是危机的当事方，但却拥有某种法理和道义优势，可以成为制约危机发酵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知名智库“瓦尔代国际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的专题辩论中，俄罗斯专家就非常自信地提到，“俄罗斯不会因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而遭受更多损失。”^① 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争取身处中导危机漩涡中的俄罗斯，这对于国际社会平稳度过中导危机带来的混乱与无序具有积极作用。2019年6月5日，中国与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决定退出《中导条约》将破坏战略稳定，加剧紧张和不信任，使核导领域的不确定性骤增，引发军备竞赛，并使世界多个地区冲突风险上升。中俄两国主张条约当事方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分歧，恢复条约活力，防止事态朝上述方向发展。双方将就此保持密切对话，协调立场。”^②

欧洲既是中导危机的重灾区，也是各种核力量之间矛盾汇聚的焦点，欧盟与北约多个成员国虽然均为美国盟友，但它们同时也与俄罗斯拥有难以割舍的地缘政治关联。如果中导危机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欧洲将成为直接受害者。欧洲国家和相关组织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客观上需要对维护国际核军控体系保持积极态度，不会公开支持美国肆意退约的单边主义行为，也不会支持美、俄两国行将开启的军备竞赛。因此，北约、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中导危机处置中注定不会与美国完全保持同步，它们会表达自身的战略诉求。“任何有助于恢复全球军备控制的欧洲倡议都会受到欢迎，欧盟在《伊朗核协议》的签订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外交力量有助于实现外交成功。当然，与盟国展开合作（尤其与北约展开合作），以及在外沟通渠道中刻意保持低调，这些都有助于取得成功。”^③ 为此，中国应充分认识欧洲各个国家或组织的战略诉求与美国的差异，中国完全有可能与欧盟、北约以

① Evgeny Buzhinsky and Alexander Khranchikhin, “Russia will Not Lose Denunciation of the INF Treaty,” Valdai Club, June 28, 2017,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will-not-lose-from-the-denunciation-of-INF/>.

② 《中俄联合声明称：核武器国家应停止毫无限制地发展全球反导系统》，中国新闻网，2019年6月6日，<http://cul.chinanews.com/gn/2019/06-06/8857684.shtml>。

③ Sico Van der Meer, “The Demise of the INF Treaty: Can the EU Save Arms Control?” Clingendael Institute, January 24, 2019,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demise-inf-treaty-can-eu-save-arms-control>.

及欧洲国家展开直接对话，求同存异，寻找最大的安全公约数，集体反制美国肆意破坏国际核军控体系的行为。

总之，中国作为国际新兴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区域安全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大责任，对推动国际社会解决中导危机、全力消除危机的消极影响责无旁贷。在中导危机处置中，为制止美国沿袭冷战思维，阻止其各种利己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单边主义行为，中国必须提出自己的安全理念、话语以及规则，以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方法弥补国际社会在核力量结构中的理论空白与手段欠缺，充分运用中国智慧，在危机处置中推动各相关方展开对话与合作，谋求互利共赢，推动中导危机得到解决，避免因美国一己之私而将国际核军控体系带入危险境地。

毋庸置疑，中导危机给中国带来巨大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对中导危机的处置，确保危机得到有效应对，这既可以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真正创立中国的话语空间，使美欧等国更大程度接受中国的话语、规则。这无疑有助于削弱或者打破欧美各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话语与规则垄断，有助于推动国际核军控体系向着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建立共通共融的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安全新秩序。

[责任编辑：孙震海]